

为自由的民主计划和社会技术*

——曼海姆晚期社会学思想解析

关 锋

提要:曼海姆的以“为自由的民主计划”来重建社会为主题的晚期社会学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多有误解。曼海姆认为,社会计划本身是中性的,它和正确理解的自由、民主不但不冲突,反而内在契合;为自由的民主计划和重建社会的实现有赖于社会技术,其中教育和现代议会宪政推行的三权分立和制衡等社会技术非常重要。曼海姆的晚期社会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当今转型期的中国很有理论借鉴意义。

关键词:曼海姆 社会计划 自由 民主 社会技术

一、“两个曼海姆”? ——曼海姆晚期 社会学的重新思考

卡尔·曼海姆或许算不上社会学顶级大师,远不能和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量齐观,但作为法国社会学泰斗阿隆(1992:83、109)评价甚高乃至“十分佩服”的人,足以跻身20世纪重量级社会学家行列。科瑟(1990:474)在名著《社会学思想名家》中为他单列一章评介,可资佐证。科瑟这样做,概因曼海姆“充满活力的大脑使他在社会学许多领域内都有所建树,但……有关知识社会学的论述是他全部著作中最有价值和最不朽的部分”。科瑟此论定庶几为时人之共识,如珀杜(1992:9)界定“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斯温杰伍德(1988:306)说曼海姆“为知识社会学做出了欧洲人的主要贡献”。瑞泽尔(G. Ritzer)说得更高调,曼海姆“几乎单枪匹马地为知识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改革开放视阈下我国社会意识变动趋向与规律研究”(10z&048)研究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启发性意见。文责自负。

社会学的出世作出了自己的反应”(转引自周晓虹,2002:412)。

正因此,一些社会学教材或思想史类著作大都把曼海姆作为知识社会学主要创始人对待;对其专著、专文性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理论、知识社会学等公认的早期思想上。相较之下,其晚期(大体以从德国移居英国为判准)著作和思想受到的关注远远不够。^①这样做固然有一定道理,因为诚如柯林斯等人(2006:371)所言,“曼海姆最早是以1929年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确立其地位的”,但由此造成的问题亦不容轻视。因为这无疑大大简化了曼海姆思想的复杂性,无助于全面深入的把握;更需注意的是,这样做不但容易导致把曼海姆前后思想人为割裂开来,主张两者呈“断裂式”样态,而且还很可能在此基础上因前者的原创性而贬抑后者,形成所谓“两个曼海姆”(前后期明显断裂、水准判然有别)的解释定式。科瑟(1990:484、495)的说法最具代表性:“曼海姆的思想风格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变化,‘德国’的曼海姆与‘英国’的曼海姆判若两人”;“曼海姆的英文著作与他早期的著作判若云泥”。曼海姆研究专家西蒙斯也说:“曼海姆从未将他的知性倾向与英美社会科学专业环境完全融合在一起”(曼海姆,2002a:5)。

笔者以为,这种貌似合理的武断认定,实则遮蔽了很多内里的细微真相。曼海姆的晚期思想主要集中在1940年的《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②(后简称《重建》)、1943年的 *Diagnosis of Our Time*^③(中译名应为《时代的诊断》)、1951年的 *Freedom, Power and Democratic Planning*^④(中译名应为《自由、权力与民主计划》,后简称《计划》)所谓的“三

① 特别是深入细致且精准独到的专文、专著性研究尤为匮乏。笔者通过 Google 学术搜索发现,对曼海姆晚期三部主要著作的简短书评有几篇,由凯特勒(David Kettler)与梅嘉(Volker Meja)合著的 *Karl Mannheim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The Secret of These New Times* 以及依德(Colin Loader)与凯特勒(David Kettler)合著的 *Karl Mannheim's Sociology as Political Education* 两书,以及凯特勒(David Kettler)、梅嘉(Volker Meja)和斯蒂尔(Nico Stehr)合写的 *Rationalizing the Irrational: Karl Mannheim and the Besetting Sin of German Intellectuals* 一文,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专著和专文。但它们都称不上是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尤其是不重点关注“为自由的民主计划”、“社会技术”这两个最重要的论题。而中国学界表现更为明显,依据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的搜索、查找,对曼海姆晚期思想进行整全性、综合性的专文、专著研究至今尚付之阙如。涉及晚期曼海姆思想的也只有寥寥几篇。

② 这本书最为全面地展示了曼海姆晚期社会学的主要思想,有学者(亦是其中文译者)为此指认它为曼海姆“学术生涯后期最重要的著作”(张旅平,2006)。

③ 这最初是曼海姆1941年在牛津大学演讲使用的题目,后以此为名把系列相关文章集结出版。

④ 这是曼海姆逝后,由劳(Adolph Lowe)整理出版的文集,它在很多地方是对前两部著作的展开和细化。

部曲”中。“为自由的民主计划”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重建构成它们的共同主题,这具有明显的现实关怀意味和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前期偏重书斋式的纯学术研究确实迥然有异。但在这种迥异的背后,实则存储着诸多内在关联乃至前后贯一。《重建》许多章节早在德国期间就已完成、出版,尽管到英国后进行了大量增补和修缮,以至于可视为一本新书,但其主要观点、基本框架大体上一仍其旧。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偏左立场上的卢卡奇(1997:577)据此点名批评本书的一些观点,如战前的知识社会学一样,是一种对战后反动思潮无条件投降的意识形态。而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核心论点、视角——社会情境决定论(主张任何人性、思维都是由社会情境决定的)在其晚期著作中屡见不鲜,《重建》还专门批评了那种视人性永恒不变、自由市场恒定有效的“静态心理学”(曼海姆,2002b:179)。正因此,阿多诺(Adorno,1997:35-49)在文集《棱镜》专文批评《重建》时将它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捆绑在一起。集中在《文化社会学文集》中的文化社会学是与知识社会学紧密相关的曼海姆早期重要贡献,其一些基本要旨在晚期著作中也得到频频响应,“三部曲”都多次强调人的价值观对社会转型和重建的根本性。这也是诸如卢卡奇、阿多诺等批评曼海姆社会学偏离了唯物史观主要原因之所在。还有,这部早期文集中对阶级概念、阶级社会学的拒斥,对文化民主、大众社会的预测等观点,恰恰成为其晚期著作的重要论题或主题(Mannheim,1956:142-158,171-238)。专事曼海姆研究的凯特勒和梅嘉颇为遗憾地指认:“曼海姆最有影响的著作关涉两个独特的概念即‘知识社会学’和‘为自由的计划’,但它们却常常被人们分开看待”(Kettler & Meja,1995:9)。

曼海姆大概是明确提出“大众社会”概念的第一人,^①被公认为大众社会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贝尔,2001:8-9;斯温杰伍德,1988:317),亦是情感社会学(郭景萍,2007)、教育社会学的重要开拓者(闰引堂,2009)。但所有这些贡献,是由其早期、晚期作品合力完成的;人为地把二者分开,往往就无法准确定位这些理论贡献。

鉴于此,默顿(2006:735-736)以下这个提醒,不失为合理之说:“曼海姆的理论一直在不断地变化着,因此,不能勉为其难地把曼海姆的早

^① 这参考了百度百科“大众社会”词条的说法。

期研究或晚期研究看作是他的成熟观点的代表”。“曼海姆的主要贡献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社会科学家们对此很可能众说纷纭。而曼海姆自己希望成为一名当前社会变动的观测者。”厄内斯特·曼海姆(Manheim,1947)此说,更是知音之论。

一些人之所以看轻曼海姆晚期社会学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计划与自由、民主议题过于普泛、宏大。严格说来,这不够客观公正。其一,该论题虽宏大而普泛,但它确是事关人类发展根本走向的重大问题,切不可因题废言。其二,曼海姆在这个论题上可谓严谨求实、勤勉认真,绝非谋名投机之为,如,《重建》中文版列出的参考文献目录将近140页,实属罕见;《计划》英文版(16开)注释近60页;就笔者的审阅,基本囊括18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的理论名家和相关名著,可谓涉猎广泛、博采众长,但又非生吞活剥、生搬硬造,而是力图融百家之论、成一家之言。其三,曼海姆关于社会计划的探讨不但有不少深刻的洞见,而且不乏新奇思考和独到见解,其理论努力理应赢得尊重。其四,曼海姆的晚期社会学,无论生前身后,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和争议,反对、批评和赞许、认同的阵营皆洋洋大观,算得上是思想史上的一段奇景。凯特勒和梅嘉为此专门强调,曼海姆“关于时代危机、重建和计划的著作……很快就促成了战时英国关于计划的争论,这要归功于A.林赛、艾略特、马林诺夫斯基的兴趣。它引起了美国的杜威、芒福德的兴趣,并激起波普、哈耶克、达尔(Robert A. Dahl)以及林德布鲁姆(Charles E. Lindbolm)作出很有影响的反应”(Kettler & Meja,1995:2-3)。确切地说,这个指认远不是全面的,在直接点名质疑、批评者中,除哈耶克、波普外,还有诸如M.波兰尼(Mullins & Jacobs,2005)、E.席尔斯(Pooley,2007)等赫赫有名的人物,而在点名认可乃至赞扬的队伍中,除杜威外,还包括著名基督教学会The Moot的众多成员,著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坦普尔也力挺之(沃森,2006:444)。围绕社会计划所形成的争议,反对派和赞同派都阵容庞大,思想名家不胜枚举。仅就曼海姆曾就职的伦敦经济学院而言,拉斯基(Harold J. Laski)、韦伯夫妇(Sidney J. Webb & Beatrice Webb)、托尼、华莱士(Graham Wallas)都是计划的支持者,无不鼎鼎有名(艾伯斯坦,2003:59,68-70),在这方面,曼海姆绝非踽踽前行者。其五,曼海姆的晚期社会学,其中不少观点对当今社会特别是转型期的中国不无启示和借鉴价值,对之很有必要认真梳理和深入探究。

二、古典自由主义泛滥^①和大众社会降临： 缘何需要社会计划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40年代无疑是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多事之秋”，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大萧条不期而至，劳工运动此起彼伏，启蒙运动所传扬的理性、自由、民主显然没有很好地兑现。阐释、反思和诊断这些社会问题与异象，一时间成知识分子之风尚。包括韦伯、涂尔干在内的早期经典社会学大都属于此列；颇具轰动效应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之《西方的没落》、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作品亦属典型之作。诸如危机、向何处去、诊断、重建等字眼不时见诸报端和著作题名。拉斯基1933年出版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40年出版的《我们向何处去》，以及托尼1920年出版的*The Acquisitive Society*(中文更合理的意译为《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无不带有这种时尚的烙印。

这些分析、诊断大体有以下几类：其一是从文化高度进行整体性分析，这以《西方的没落》为代表；其二是专门分析基督教文化演进与资本主义当代社会，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特洛尔奇(Ernst W. Troeltsch)《基督教会及社团的社会学说》很具代表性；其三是从传统社会解体以及个人和社会关系角度进行分析，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为典型；其四是从理性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如韦伯上书及《经济与社会》、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等；其五是对极权主义的分析，赖希(Wielhelm Reich)《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弗洛姆《逃避自由》、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经济人的末日》、胡克(Sidney Hook)《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劳辛格(Hermann Raucshnig)《无政府主义革命》，都是遐

① 在曼海姆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其核心信条如个人权利至上、反对国家干预在现代已不合时宜了，它的泛滥不但助推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并对之无能为力，且加速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对社会失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无论是对自由主义比较成熟且影响更为深远的英国，还是对自由主义传统比较薄弱的德、法，大体一样。客观地说，曼海姆的这个“时代的诊断”有偏颇之处，比如：其一，德国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社会的特殊性如长期缺乏民主法治传统造成的，德国之所以迅速走向法西斯，恰恰与这种传统匮乏有关；其二，曼海姆忽略了自由主义巨大的自我纠治功能，二战结束后，英、美通过自由主义的自我纠治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并创造了几十年的繁荣稳定。这是曼海姆所未能看到的，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评判因此有失全面。

迹知晓的名作；^①其六是对大众社会、工业社会的分析，诸如勒庞(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加塞特(Jose O. Y. Gasset)《大众的反叛》已成大众社会理论之经典，而霍桑实验主持者梅奥(George E. Meayao)的《工业社会中人的问题》、《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则成为那个时期研究工业社会的重要作品。

曼海姆晚期社会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萌生的，三部曲中分别用了诊断、重建字样。他充分借鉴以上研究成果，但又独树一帜。首先，他强调西方社会新近出现的异象、动荡，“并非由一系列不快之事和孤立的骚乱构成”，而是标志着“一种旧社会秩序的缓慢的或有时迅速的解体”，“并非暂时的不安稳，而系结构的根本变迁”，这意味着“承认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和结构基础已经完全转变”（曼海姆，2002b:4、9）。显然，曼海姆于此颇得马克思主义之神韵，不流连于表象，强调社会基础、结构的根本性。其次，这种根本变迁实质是什么？答案是工业社会。工业革命不但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带来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而且促进了现代技术的形成。正如芒福德(2009:193 - 223、281 - 317)在30年代指认的，现代的“新生代技术”与早期技术差距甚大，不可同日而语，新能源动力、科学化使其具有前所未有的功能；更重要的是，现代技术早已逾越了物质生产领域，渗透进政治、教育、交流和宣传等各领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由它们大量涌现造成的技术基础的变化也同时影响了社会结构。对此，雅斯贝斯(1997:29 - 58)倒是有清醒的认识，而很多人却熟视无睹。马克思固然慧眼如炬，看到了技术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但他主要从生产领域看待技术，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后一种技术。

社会结构变化具体如下：一，现代技术使物质财富增长，人们基本生存之忧越来越少，并且使教育、知识传播越来越便利，这样“让大众保持其以前的无知状态是愈加困难的”；与知识民主化相伴随，“今天，愈来愈多的群体在奋力参与社会和政治控制”，形成“社会的基本民主化”。精英的构成、选拔机制发生变异。二，现代技术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整个社会越来越精巧复杂，但正像马克思社会化大生产理论揭

^① 曼海姆早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就开始研究过极权主义的问题，其晚期著作接续了这个思想。他实际上属于早期极权主义研究队伍中重要的一员。关于早期极权主义研究，国内学者孙传钊先生(2007)有过很好的梳理和分析，其间亦提及曼海姆。

示的,“大规模工业的技术迫使个体财产所有者放弃其相互竞争的态度,联合其资本,形成愈来愈大的企业和工业组织”(曼海姆,2002b:37、38、56)。除企业外,社会每一部分以及人与人之间也日益相互依赖,内在地要求相互协作。用涂尔干(2000:73-158)的说法,劳动分工越发达,越能推动并越需要团结。此为“日益相互依赖原则”。

问题是,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古典自由主义,其基本信条诸如讲求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以及因此所形成的经济人假设、鼓吹最少干预和自由竞争、有限政府论、市场至上论等,和上述变化相抵牾甚至格格不入。曼海姆认为,这些基本信条,要么根本不成立——如个人先于社会的个人主义观点,已经遭到涂尔干(2000:236-237)、库利(1989:22-32)、米德(1992:120-197)等人的有力辩驳;对市场至上论的错误,卡尔·波兰尼(2007)给予了精辟的分析;经济人假设则有德鲁克(杜拉克,2005:41)对之深入批判,纯粹的经济人和孤立的经济领域根本不存在;要么完全不合时宜,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可是,它们全面渗透并深刻影响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深入很多人内心深处,成为他们进行价值评判和行为取舍的信念。其滥觞造成了全方位的社会危机:

一,相互依赖原则使人与人、社会各单元的协调和合作越来越重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每一个生活领域,调节原则正在取代竞争原则”。但古典自由主义死守教条,反对调节、干预,造成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撕裂了个人和社会的有机关联和团结纽带。自由放任和无计划是“现代社会失调的主要原因”(曼海姆,2002b:4、18)。

二,现代技术和古典自由主义合力,扰乱了社会有序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精英形成和选拔机制。“自由民主社会的危机首先归于这样的现实:以前有助于创造性精英发展的社会过程,现在有着相反的作用,亦即变成精英形成的障碍”。具体来说,精英数量随着知识普及的便利不断增加,难免鱼龙混杂;排他性崩溃——越来越庸众化和功利化,丧失了升华的冲动;精英选拔成就原则超越了传统血统原则和早前的财产原则,虽有进步,但因没有和机会均等、公正等原则相结合,往往片面化为经济和财富的成功,沦为“消极选拔”;精英构成由此变动,具有宽广人文情怀和升华动力的越来越少。“正常的选拔机制往往把文化价值的载体推至顶点……而现在,消极的选拔却把杰出的地位给予了那些不能达到现代文化标准以及缺乏驾驭其冲动和自我控制

的人”(曼海姆,2002b:73、80)。

三,大众社会的形成。正如加塞特(2004:6)指出的,“社会总是由两部分人——少数精英与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平衡。”问题在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市场和技术,使滕尼斯所谓“共同体走向社会”的转变不断加深,大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和变动性,从“有机的公众”变为“解体的公众”,再加上文化民主化带来的“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结果“提高了完全流动的大众的重要性”,“普通人贫乏的智力和狭隘的眼界却赢得了普遍的尊重和重视,甚至突然成为人们寻求遵循的模式”(曼海姆,2002b:80-82、84)。显然,大众社会的问题不在于有大量的大众,而在于勒庞(2000:6)所强调的,大众将是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或“惟一的、无可匹敌的力量”。在曼海姆看来,固然不能像勒庞那样把大众简单地视为盲从、非理性的代名词,且非理性也并非总是有害,“并不必然瓦解社会”,如果整合、引导和利用得好,它恰恰是社会升华、进步的重要动力,但古典自由主义、工业社会和大众社会的重合、叠加,确实使非理性问题凸显出来,“就道德和理性的进步而言,在最近几十年中,我们与其说是取得了进展,还不如说是出现了倒退”。为何这样断言?正如韦伯分析的,工业社会、市场机制的量化原则使形式合理性、目的理性得到张扬,再加上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体经济理性的捍卫,使功能合理性“亦即根据客观的目标组织社会成员的活动”的能力得以盛行,却为实质合理性即“依据某人自己对事件的相互关系的洞察在给定的情境中明智地行动的能力”(关涉个体理性思考、洞察力和责任心)的发展“极少提供余地”。而“客观活动的功能化最终引起自我理性化”,大部分民众是依据功能理性形成个体理性的,逐渐丧失了独立反思—洞察力和自觉的责任感,受功利主义、竞争性思维支配,日益短视,对复杂的公共政治、道德生活这些更需实质合理性的领域缺乏应有的辨别和判断,经常诉诸非理性。“在一个大众社会趋于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没有被整合进社会结构的非理性会强行闯入政治生活”(曼海姆,2002b:42、46-48、51)。这是大众社会特有的危险,因为民众是在非理性支配下选举的,那些不是努力培育民众实质合理性而是迎合、操纵、利用民众非理性的政客,很容易成为选举的获胜者,所谓的自由竞争、成就原则都没有获得好的结果。此为“消极民主化”。这在旧秩序溃败期间最易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是明证。

总之,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大众社会,它产生了乌合之众所特有的

所有非理性和情感的爆发。作为一个工业社会,它如此精致的社会机制,以致最轻度的非理性干扰都能够具有最深远的影响”。“每时每刻都有摧毁社会生活的整个精巧机器的危险”。法西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防止社会秩序破散、动荡混乱而生的,它“本身是从大众民主力量消极作用中成长起来的”,是自由放任主义和情绪民主的结果。但它采取了操纵、利用大众非理性这种不正常的方式来干预、控制社会,固然在客观上回应和体现了日益相互依赖原则,但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有序与稳定,只不过使“社会从无组织的不安全阶段过渡到有组织的不安全阶段。从整体上讲,社会仍是不安全的,因为社会功能紊乱的原因并没有被消除”(曼海姆,2002b:49、87、121)。而正常、合理的解决之道就是使实质合理性统驭功能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把非理性纳入理性的轨道。有人(Kettler et al., 1990)就此以“非理性的理性化”来概括曼海姆晚期思想要旨。社会计划实质上就是“对非理性的理性控制”(曼海姆,2002b:246),非理性的理性化是通过社会计划实现的。这就是重建社会的关键和根本。因为“自由的大众社会在其发展上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其中,不断的放任自流导致了大灾大难。甚至在文化领域,如果没有计划,我们也将不能取得进展”,“在工业社会的现阶段,不论形式如何,计划都是不可避免的”(曼海姆,2002b:3、91)。尽管遭到米瑟斯(Ludwig V. Mises)、哈耶克等人的竭力抵制和批判,但正如英国工党著名人物杜尔滨(Durbin, 2003:41)在1949年所总结的,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使人们对自由放任的信心迅速坍塌,结果“现在我们是计划者”。当然,这里所谓计划,重点是社会性的计划。

三、为自由的民主计划:社会计划为何而在

米瑟斯等人除批判计划在现代复杂社会市场经济中既不可能制订也不可能运行外(米瑟斯,2008a:78-181;哈耶克,1989:110-188),还主张推行计划必然形成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背道而驰。比如米瑟斯(2008a:42)在1920年代就宣称“只有在自由主义框架内,民主政治才能履行某种社会功能。没有自由主义的民主只是个空壳”。在1947年一次演讲中更直言不讳:“认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按照民主的统治方式加以管理,这是痴人说梦……只要有计划在,便无民主的立

足之地”(米瑟斯,2008b)。哈耶克(1997:71)在1940年代初强调:“我们的要点与其是独裁必然不可避免地消灭了自由,毋宁是计划导致独裁”。即使是对凯恩斯主义颇认同的迈克尔·波兰尼(2006:159),在1940年的一次演讲中也宣称:“全面的计划是对自由的大规模的毁灭;对文化进行计划将使所有灵感窒息,一切创造的努力付诸东流,对经济进行计划,将使生活变得既像全民修道院又像强迫劳动营”。在曼海姆看来,上述等人既对社会计划也对自由存在偏见和误解,而当时已有不少思想家在计划、自由问题上作出了很好的阐释。杜威在1933年就指出:“我们坚信社会需要计划,并且计划是走出混乱、无序和不安全的惟一出路。但是,一个计划社会和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是有区别的,这就是专制与民主的区别……以及压制个性与最大限度地释放和利用个性之间的区别”。晚些时候他强调社会计划“为了什么目的而实行”(转引自孙有中,2002:177-178)才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拉斯基(1965:182、366)在1943年说得更明白:“计划本身是不偏不倚的,它是民主还是不民主,要看它所抱持的目的是什么”;认为“自由和计划化社会是两个对立的名词,那是不对的”,计划、自由、民主完全可以统一起来,那就是“计划化民主”。曼海姆在此基础上坚定地主张:“并非所有的计划都是恶魔。我们应该把为强制一致的计划和为自由、多元化的计划区隔开来”。“问题在于是好的计划还是坏的计划,是专制的计划还是民主的计划”(Mannheim,1943:1、4)。“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系统的性质和功能并不要求牺牲我们的真正自由或民主自决的思想”(曼海姆,2002b:4)。正因此,“我们的任务是依赖计划去建设一种社会体制,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计划,它必须为自由而计划,必须服从于民主控制”(Mannheim,1951:29),可称之为“为自由的民主计划”。

为自由的计划并非全面干预、控制,它“理应保留自由竞争的领域,让它们和计划领域并存”;“一个为自由而计划的民主社会不仅应该使那些基本的和私人性的关系免遭管治,相反要利用它的威权来确保这些自由,以此来尊重那些自由主义的遗产”(Mannheim,1951:98、182)。比如在私人生活领域个人选择、结社的自由,它们是培育独立思考、自信等个性和社会创造性的温床,所以自由计划“并不压制生活的真正的原动力”,“相信计划者能够确定在哪里止步”,而且“还必须为批评安排空间”(曼海姆,2002b:88、248、323),既捍卫言论自由和民主,也为计划的科学性奠造地基。由此,它和专制独裁、极权主义完全

是两码事,它时刻铭记杜威(1987:100)在30年代的警醒:“更多地给予个人以自由,把个人的潜力解放出来,这个观念 and 这个理想是自由精神永远存在的核心;它是和过去一样正确的”,以及胡克(2006:256)同期提出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计划社会,要是不为最自由的批判、差异、创造的个性、趣味上的宽容准备条件,就从来也不可能保证真正的安全”。不过,这也需要对自由正确理解,正像卡尔·波兰尼(2007:215)说的,“除非理解了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真正意义,否则我们无法得到我们所要寻找的自由”。哈耶克等人之所以对计划存在偏见,对自由的教条化理解是重要原因。实际上,库利(1989:275、277-278)早就提醒人们,没有限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只有在一定社会秩序中才能存在,并通过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而发展,它和纪律、控制绝不是相互排斥的。霍布豪斯(1996:44-45、49)在1912年就反思说,真实的自由只能是社会中的自由,非社会的自由只是理论上的,任何时代的社会自由都以限制为基础,要维持个人自由和平等,就必须扩大社会控制的范围。而杜威在1930年代也反复提及,个人只有跟大规模的组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自由,而这样的组织又成为自由的限制(杜威,1964:50);自由是具体的自由,没有一般的、概括的、绝对的自由,“自由总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人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在社会上有组织的明智控制的支持与指导之下的”(杜威,1987:81、90-91)自由。

曼海姆(2002b:344)为此也特意强调“对自由的真正理解是行动的前奏”。而“真正的自由不可能是抽象的,只存在各种具体的自由……只要社会运行良好,所有人都被不同的规则和责任所框限,但他们同时在这些框架内是自由的”。“一个民主计划的社会将会认为个人自由是在社会关系中存在”(Mannheim,1951:15、279)。古典自由主义宣扬排除社会干预和限制的个人自由纯粹是虚构,此外它“以否定性的措辞,或以仅限制其范围的箴言形式”来表达自由,也是远远不够的,还存在着“某种更高形式的自由”,它既肯认和个人自由辩证统一的集体自由,更强调自由的积极性,恢复和弘扬“自我作出重大决策的责任”(曼海姆,2002b:317、351)。作出合理计划就是践履这种责任的重要途径。正如拉斯基(1965:386、396)所强调的,“在计划化民主国家里,自由的概念成了一个积极的概念”。“它设法组织社会,使个人的目标和社会的目标调和起来”。社会混乱、无序是个人自由最大的

敌人,而社会计划则是医治社会失序的根本路径,“为自由而计划便是保持自由的惟一逻辑形式”(曼海姆,2002b:353)。正确理解的自由和社会计划内在契合。

同样,为自由的计划“与民主不仅可和谐共存,甚至还是互补的”(曼海姆,2002b:334)。当然,这也需要正确理解民主。早在其文化社会学形成期,曼海姆就指认民主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文化结构,决非仅仅是政治,其基本意指:所有人本质上一律平等;个体自治;一种独特的“选举或监控精英的方式”,这源自个体对自治意愿必要的自觉放弃(Mannheim,1956:176-180)。曼海姆晚期则对此进行大大丰富和拓展:首先,“民主直接理解意味着一种关于权力的学说,它旨在确定各种公共权力的分配和支配方式,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效率和自由”,“无论何种形式的民主,都寻求对权力的控制”(Mannheim,1951:45、71)。古典自由主义提出的限权民主、三权制衡有其合理之处。其次,民主不仅是平等的个体自治,更是集体自治,后者核心有二:参与和共识。“民主的运行本质上以民主共识为根基”(Mannheim,1943:6)。而这种共识绝非古典自由主义选举和代议制以利益交换所形成的讨价还价,而是建立在诸如共同价值观、共同生活背景上的一致同意。这种民主的实质就是杜威所谓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它较之“一种管理政府的方法、以及通过普选和被选出的职员来立法和处理政府行政的方法要宽广得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关键……可以这样表达出来:在形成调节人们共同生活的价值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每一个成熟的人的参与”(杜威,1987:43)。为了这种同意和共识,人们在共同生活中,“互相自由协商支配一切”(杜威,1981:343-344)。

正因此,为自由的民主计划“对于大多数人必须是可接受的”(Mannheim,1951:36),是民众广泛参与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正如拉斯基(1965:373、379)“同意的革命”声张的,“要使计划和维护自由相容,就一定要有人民的一致同意”,因为“如果计划不是以同意为基础”,“成为民主的可能性,至少是微乎其微的”。此外,即使明知“计划社会的民主建构问题主要在于避开官僚专制主义”(曼海姆,2002b:354),“一旦权力过于集中,在关键的位置必然产生专制”,但“集中化是必需的,因为把各种不同的尺度统一起来对计划来说是根本的”(Mannheim,1951:113、118-119)。“有计划的社会将总是不得不依赖于非常强固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计划民主同时注意权力的限制和分

散,除三权分立外,还鼓励社会团体首创精神,实现中央集权和地方、社会分权自治良性互动。还有,民主就其结果而言,就是为民谋利,满足和促进公共利益,所以“社会服务的扩展也是计划的真正精髓”(曼海姆,2002b:294-295、323),民主计划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Mannheim, 1951:116),计划政体要成为服务性、公益性的。

四、社会技术与人的改造、权力制衡:社会计划何以进行

依据什么进行为自由的民主计划?答案的关键是社会技术。曼海姆在《计划》的一个注释里专门说明,他主要的晚期著作都涉及社会技术(Mannheim, 1951:6),这是它们共同的核心词。

工业文明以来,技术特别是物质生产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至在19世纪中叶不但出现了被后人理解为技术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在1877年还出现了第一本研究技术的哲学专著(即德国人卡普[Ernst 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对技术的专门研究兴起,一些新的观念随之滋生。比如德国工程师基默尔(E. Zschimm)1914年发表《技术哲学》,把技术本质归结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是“物质自由”,而非卡普所谓器官投射和自然无意识演化结果;加塞特1930年代的《技术的沉思》强调人就是“技术性存在”,技术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规划”(参见米切姆,2008:38、61)。同期最重要的技术思想家德韶尔1927年进一步提出技术是主体的创造行为及“理念的现实化”(参见王飞、刘泽渊;2005)。他们都不再把技术简单视为器物工具,而是和人的本质、人类解放联系起来。

曼海姆认为,关于技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观念变化。把技术视为有形的工具和生产制造的“工业技巧”是世纪之交的主流观念,但它在当时就受到冲击。韦伯(2007:11-12)在1904年前后指认“近代理性的经营资本主义,不但需要可以估量的技术性劳动手段,而且还需要按程序规则行事而可资估量的法律与行政”,后者关涉“法律技术”。在20年代的《经济与社会》中,韦伯(1997:87)更明确地说,“合理的”技术意味着应用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以经验和深思熟虑为取向的手段,对于一切行为来说,都有该意义上的技术,如教育技术、政治统治技术、管理技术、战争技术、司法技术等,它们都能达到一种极为不同的合理的程度。受此影响,桑巴特

(Werner Sombart)在1911年撰写《技术论》一文,将技术划分为广义上达到一定目的的适当手段和狭义上用于创造物质财富的操作方法(参见仓桥重史,2008:19);奥特利连菲尔德(F. V. Gottl-Ottlilienfeld)在1914年提出了一种新的技术分类,“其客体是个人之间关系的变革实践”,如治安技术、政治权力获得技术等(参见戈菲,2000:21);舍勒(1999:173-175)在1924年提出了作为自我内在控制的“心理技术”和“生命技术”;斯宾格勒1931年发表《人与技术》,指出技术就是生活之策略,技术是为目的而活动的事实而非事物,不能仅仅用器具观念来理解(Spengler, 1932:8)。

更为重要的是杜威,他在1919年一次演讲中明确肯定“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杜威,1999:8)。他在1930年的论文《我相信什么》中更为详细地说,技术“系指所有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指导和使用自然界和人类的各种能量的智慧性的技巧;技术不能仅限于少数物质的和比较机械的形式。面对它的诸多可能性,传统的经验概念是过时了”。“技术当然包括那些用以制造出铁路、汽轮、汽车……的工程技术。还包括……在教育和其他一些模式中采取的某些新方法”(转引自夏保华,2009)。

在此基础上,曼海姆坦陈,技术起初只用于像机器那样的有形物体,但实则还存在另一种技术进步,只是“对于把它描述为技术的,我们一开始就踌躇不决,因为与它相关的并非可见的机械,而是社会关系和人本身”。它们大都无形无体,但本质和有形技术一样,都是合理性的实现。最典型的是组织技术,它甚至比有形技术更重要,没有它就没有整个社会系统。曼海姆界定说:“我将在整体上把这些以塑造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为其最终目的的实践和动作看成是社会技术”(曼海姆,2002b:225-226,229)。它们是“所有旨在影响人们之间行为的手段总和”(Mannheim,1943:1),“是所有影响人们行为的方法,使人们的行为适应于当时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的主导模式”。它们“存在于政治、教育、福利、交流、宣传等诸多社会领域。其本质只有在最近几十年才显现出来”(Mannheim,1951:6)。

如果说社会技术在古代还是自然地起作用的话,在现代则日益和社会意图结合起来,影响越来越大。当代大众社会的兴起和极权主义的形成,社会技术不可或缺:“最近这些年从民主国家向极权主义体制的转变,应更多地归咎于社会技术的变化,人们心理变化的影响远不如

前者”。而且“它们从根本上限定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取向”(Mannheim, 1943:2)。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社会技术没有引起他们足够重视。另外,技术“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都是作为一种寻求或助长私人权力的手段而被发展起来的”,和权力密切关联。而在现代社会已有的历史中,社会技术的“巨大成效更偏向于为少数人的掌控服务……通过诸如电话、电视以及其他空中交流工具,政府和行政管理领域中的集中化控制很容易完成”。“它们倾向于滋养集权化,如少数统治、专制”(Mannheim, 1951:7-9)。一些人因此对社会技术抱有偏见和敌意,倾向于把它和专制独裁挂钩。在曼海姆看来,这实是一种误解:“之所以称其为技术,是因为它们像所有的技术一样,本身无所谓好坏,一切取决于人类使用的意图”。“如果缺乏监管而自行发展,它们会导向专制,如果被用以好的目的并受到持续的监控,它们将会跻身于人类最重要的成就之一”(Mannheim, 1943:2-4)。

正因此,社会技术完全可以和自由民主相容。事实上,“计划的自由只有通过精心和巧妙地掌握这些技术才能加以获得”(曼海姆, 2002b:246),而“通过运用高效的社会技术来推行民主,这种可能性是更为宝贵的财富”(Mannheim, 1951:73)。那么,这如何实现呢?

其一,社会技术是和社会科学紧密联系、相互促动的,二者良性互动:一是有助于民众科学普及和启蒙,实现社会性的智力均衡发展,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民主,所以“真正的民主理应与理性的科学以及通过大众沟通媒介和高度发达的教育技术极易进行的知识传播联合起来”(Mannheim, 1951:73)。二是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情境,为科学的计划奠定坚实基础,进而“从关键的地位影响对社会事务的处理”(曼海姆, 2002b:351)。

其二,古典自由主义的滥觞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认同、集体的职责,以及为了我们的态度与行为而拥有共同背景的必要性”等价值观丧失了(曼海姆, 2002b:245),当代社会真正的危机是文化危机,是“评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危机”。就此而言,建设自由民主社会仅有社会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只依赖日益成熟的新社会技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难以产生,它需要精神的指引,这比技术系统更重要”。换言之,“民主拥有一套普遍性的基本价值,它们遗传自古希腊文明、基督教传统”(Mannheim, 1943:6-7, 11),诸如集体职责、相亲相爱等,人们“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明智、清醒必须和技术相协配”(Mannheim, 1951:74)。曼

海姆之所以积极加入 The Moot 并成为著名的活跃分子,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根本的问题是“改造人的问题”,重建未来美好社会成功的关键“一部分在于社会技术性质的变化,另一部分则在于人类本身的转变”(曼海姆,2002b:178,249)。

如何改造人呢?现代大众传播沟通和教育这两种社会技术特别重要,通过它们,一则可以阐扬新价值观,使大众既知道社会计划的必要性、紧迫性,又知道团结协作比竞争更根本,激发民众协作、互助、友爱观念;二则可以培育慎思明辨的实质理性;三则能培养民主情感,民主教育政策的核心就是“通过精心利用宣传手段为民主被大众情感认可铺路”;四则能培养诸如价值标准、社会未来发展长远目标等基本共识,因为“如果这些基本的共识被摧毁,像经济危机那样的社会混乱就会随之而来”(Mannheim, 1951:141 - 142),无从谈及自由民主建设。上述宣传和培育本身就是社会计划。基本上每一种由公共权力机构或社会组织运用社会技术的过程,就是社会计划的过程,其中教育又占有特别的地位。当然,这里采用的是杜威的广义教育概念,除正规学校教育外,还包括各种社会教育,如家庭、教会、社区等共同生活教育(参见闰引堂,2009)。它对人的改造至关重要。“民主意味着对人民的逐步教育以及对判断和精炼的培养”(曼海姆,2002b:329),对自由民主计划而言,“教育是基础工作”(Mannheim, 1951:246)。

其三,如前所述,任何民主和自由都意味着对公共权力的控制,特别是不让它过于集中和独断。社会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决策和计划可交付给地方或下级政治权力、社会组织完成,这有利于权力的分散。“回答社会控制是通过一个核心领导集团来实施还是民主地分散于整个社会这一关键问题,不仅取决于社会秩序,而且还有赖于社会技术”(曼海姆,2002b:250)。社会技术还可实现权力的横向分散,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突出贡献——国家权力的三权分立和制衡这项社会技术,其实质是对控制的控制或说对计划的计划。这是自由民主计划的核心和关键。“自由主义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对社会的法律框架进行议会控制的制度……这是通过民主方法对控制之控制的发现”。“关键的问题是,作为控制和协调机构的国家本身能否被控制,亦即计划原则能否与自由和民主相谐同。议会制度史在这方面就是控制之控制历史……政府史必须被重新解释为……特殊社会技术的历史”。所以,为自由的民主计划“完全有赖于我们能否发现某些把民主

的议会控制传入计划社会的方式”(曼海姆,2002b:300、303-304、354),很好地继承和光大这种社会技术。而且,这种社会技术已制度化 and 法律化,成为宪政民主。正因此,“宪法的制定者可以被视为周密的为自由的计划之父”(Mannheim,1951:117)。立法和执法,都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技术。

因为关涉自由民主,社会技术不能“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效果”来衡量,相反,“一切经济的、行政的和教育的法典不仅要乐于思考暂时的技术效率,而且还要愿意考虑更为深层的心理效果”。“所应用的心理、社会和技术手段不仅依据其纯技术效率,而且还要按照其对于品格和个性的作用来加以评判”(曼海姆,2002b:246-247)。社会效益是社会技术最根本的目的和评判标准,它们必须人性化。

其四,一旦民众理性思维能力、道德水准、责任意识和社会技术发展同步,后者的另一些社会功能就凸现出来:一,社会沟通、交往技术使得高水平的即建立在实质理性基础上的民主共识更容易形成;二,诸如科学选举等社会技术会使德才兼备、勇于承担责任和敢于奉献的真正的社会精英脱颖而出,“以保证最有才干和最合格的人晋升”(曼海姆,2002b:323);再通过社会技术,这些精英教育、引导民众,提升民众素养,而民众监督精英,实现精英和民众的良性互动,据此进行的民众选举才有价值,从而使自由、民主真正落实。

五、批评、辩护和当代反响:曼海姆晚期社会学的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2003:91)说,“关于理性计划的理论”是由“圣西门、边沁和马克思这样的人”在19世纪推动出现的,“到了20世纪,这种思想由马歇尔和曼海姆……详尽阐发而日益凸现。这些人的信念是:世界是会服膺于理性的控制的”。确实,曼海姆晚期社会学甫一面世,就因其理性计划论遭到很多批评。

哈耶克早在1920年代就出版了几部批评社会计划的著作和文集,在曼海姆晚期社会学出炉以后,于1944年又出版《通往奴役之路》这部批评社会主义计划的经典之作,正如考德威尔(1999)指出的,这本书批评的靶心是曼海姆。该书多次引用《重建》原文进行批判,把《重建》视为采取集中计划这种“极端立场”的“最好的例子”。针对曼海姆

计划保留竞争思想,哈氏批评说“虽然竞争制度可以容许掺入一定程度上的管理,但是它不能和计划结合到任何我们喜欢的程度而仍能不失其作为生产的可靠指南的作用”。针对曼海姆认为社会计划是现代技术发展必然要求的观点,他批判说“没有什么外在的必然性迫使我们非走向计划不可”。哈氏强调曼海姆“所允诺给我们的‘集体自由’并不是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只是计划者对社会的为所欲为的无限制的自由。这是把自由与极权混淆到了极点”(哈耶克,1997:27、45、55、151)。波普(1998:60、62、67)在1944-1945年分次发表,后于1957年以英文结集出版的《历史主义贫困论》中,也以《重建》为靶标,进行了几乎是全方位的批判:“与零碎社会工程相反,总体论的或空想的社会工程……目的在于按照一种明确的计划或蓝图重行塑造‘社会整体’;它的目的在于‘掌握关键的位置’并扩大‘国家的权力……一直到国家几乎变得等同于社会’;不止于此,它的目的还在于从那些‘关键的位置上’来控制塑造发展中社会的未来的各种历史势力”。这段话中引用的词句都来自《重建》,波普判定“这部书是我所知道对总体论和历史主义纲领的最精致的阐述,因此这里选出以供批判”。在波普看来,总体论和历史主义是社会科学中最为错误的东西;曼海姆希望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干预和改造,“也包括有人的改造”,这不但是痴心妄想,更是对人性的戕害。迈克尔·波兰尼除多次强调全面计划导致奴役,计划始终存在集中化的危险,还在1951年为曼海姆《计划》专门写的书评中批评说:“这本书前后始终加以详细论证的计划,到最后仍然全然模糊不清”(转引自Mullins & Jacobs,2005)。雅斯贝斯(1989:211-215、328-329)在1949年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虽没直接点名,但他对总体计划所谓技术根源和历史认识论根源的分析,自认来自哈耶克和李普曼,间接上也是对曼海姆的批判。

如何看待这些批评?应该说上述诸人并非反对计划本身,如哈耶克赞成个人计划、波普倡扬零碎社会工程、波兰尼认可凯恩斯主义、雅斯贝斯专门区分计划和总体计划并倡导“有意义的计划”,他们真正攻击的是他们所谓的“集中计划、总体计划、全盘计划”,有些分析和批评确有道理。但把这类计划放置于曼海姆身上,是否完全妥当?

在笔者看来,曼海姆对于社会计划雄心勃勃、殚精竭虑,但纵使这样,他关于社会计划的论定仍存在诸多内在悖结。他确实不少地方提到社会计划就是“从某些中心位置来调解的统一体的重建活动”、

“力图从存在于每个情境中的**关键地位**掌握事变的整个复合”、“对整体进行计划”、“不仅仔细思考个别目的和有限的目标,而且还了解……更为广泛的目标”,但能否据此推定他鼓吹集中、总体、全盘计划?我们知道,处心积虑地与极权主义计划或哈耶克所谓集中计划划清界限,是曼海姆推出计划理论始终优先考虑的事项,所以他在很多地方同时用了另外一套话语界定计划。如强调计划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重建,绝非无中生有或推倒重来式的、从“确定而完美方案出发的”另外建立(曼海姆,2002b:139-140、171-173);计划绝非是一劳永逸的纯粹理论规划,而是根据现实情境“不得不采取询问、探究的态度”,要不断地试验和尝试错误,“为自由的计划应该有目的地实验和测试每一种社会机制,以辨明它特殊的适用性,它的权宜性,以及它是否容易民主控制”(Mannheim,1951:195),要尽可能地进行“社会学实验”(曼海姆,2002b:246)。由此他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强调计划只能以改革的方式进行;计划绝非事无巨细,也不是所有领域都要进行,它保留竞争和私人自治的领域;计划重视中央集权,但它也珍视地方分权的价值。所谓对人的改造,其核心一是培养实质理性以及独立慎思的品格,二是培育对社会计划的认同感和协作、责任等共同体意识。从教育社会学角度讲,这是促进人性的完善,并无特别值得批判之处。就此而言,曼海姆的社会计划离所谓全盘计划相距甚远。

曼海姆的上述思想,深受杜威实验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并得到杜威的充分肯定。沃林(2009:620-621、632)指出,“实验主义是杜威关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主张的核心”,而所谓实验的方法就是秉持可误主义信念和探究态度不断试验,计划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改革的和渐进性的。正因此,沃林认定“杜威原本会同意波普尔的以下观点,亦即关于‘零碎的社会工程’的概念”。但杜威却同时强调,改革(reform)就是“重构”(re-form),必须有“一个建立在全面计划之上的社会目标”(转引自孙有中,2002:205)。这与曼海姆何其相似!正因此,《重建》刚一问世,杜威(Dewey,2008:293-294)就以“重建之技法”为题写了书评,高度赞誉该书是对极权主义专制“最精采的阐述”,强调曼海姆提出为自由而行使计划,其意图不是要一个计划定了的社会,相反其中心在于策略,包括种种深思熟虑的技法和试验策略。这既是杜威的夫子自道、亦是曼海姆真正知音之见,曼海姆的社会计划和波普的零碎工程具有一定的亲缘性。而受欧陆辩证法传统影响至深的曼海姆,希望

将逐步实验、零碎工程和整体规划、长远目标结合起来,造成理论上的某些悖论,而对辩证法甚为反感的波普斥其为整体主义,自然可以理解了。上述诸批评,症结皆源于依据曼海姆的部分论述以偏概全。这只能说是情理之中而于公允之外。

由于对辩证法的深重依赖,曼海姆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剑走偏锋,尽量折中调和。正如刘小枫(1998:277)指出的,曼海姆冀求克服专制文化与放任的自由主义文化的两极摆荡,建立一个有秩序的自由文化。这仍是一种粗线条的指认,进一步细说,曼海姆希冀把大众民主与精英威权、集体管治和个体自治、情感与理性、科学领导和道德责任等对立的双方辩证统合起来。正源于此,曼海姆的核心概念不够明晰,除迈克尔·波兰尼外,柯林斯等人(2006:382-383)也指责其计划概念模糊不定;一些基本设想过于理想,科瑟(1990:487)批评说那不过是表面上的自圆其说,有人甚至批评其为“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参见苏国勋编,1996:428-429)。但公正地说,这些问题不是曼海姆独有的,很多理论家都有类似问题。

但是,有一个曼海姆自认很难回答的问题:谁来计划计划者?按照他的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优秀的精英引导、教育民众,被启蒙的民众通过科学方法运用实质理性选出优秀的精英来计划和管理的社会。这里面存在逻辑循环,而这又涉及民主和集权计划的关系问题。科瑟(1990:487)为此抱怨说:在论述民主过程和领导设计的关系时,曼海姆模棱两可。他一直避免正面谈论由谁来领导那些管理人,又由谁来管理那些计划者。这个基本议题确系曼海姆计划理论中令人头痛的关键问题。20多年后,萨托利(1998:484-485、487、491)接过这个话题。他同情市场社会主义的努力,认同有限计划,但直言曼海姆为自由的民主计划过于理想,在现实中若想使民主和计划结合,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 技术专家治国。谁是计划者?“答案:他们是专家,而不是政治家”。不能像曼海姆那样强调首先是政治家。2. 民主要从输入式(容纳多少人民的声音)向输出式(人民得到了多少利益)转化。不应奢求民众广泛参与以决定计划,因为不可能同时拥有更多的民主(即最大限度的人民权力)和更多的计划(即赋予计划者更大的权力),相反,我们应追求民主政体会厉行爱民、利民,接受民众监督。曼海姆主张民众广泛参与计划与最大程度的公益不可能同时实现。3. 驯化权力,用抗衡权来分散和牵制权力。萨托利确实抓住了曼海姆思想的内在悖论,

但他开出的疗法无疑过于保守。

除认同曼海姆文化民主化的预见,并缘此提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以及同样认可宗教具有“大修复”功能外(贝尔,1989:184、197-219),贝尔20世纪60-70年代的很多思想也承袭了曼海姆的观点。“贝尔的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它提倡一种有计划的、集权的合理化的和官僚的社会制度,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斯温杰伍德,1988:313)。贝尔(1984:399、401)认为“知识和计划……社会计划——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切有组织行动的基本必需”。正因此,“新的科技治国论精萃人物”越来越重要,但即使如此,“无论技术社会进程如何,重大的社会转折点都表现为政治的形式。最终掌握权力的不是科技治国论者,而是政治家”。这和曼海姆强调社会技术不能仅追求效率、计划而最终为复合精英掌控的思路一致。

另外,曼海姆非常看重偏向于以价值观等“柔性约束”的引导、诱变来塑造人的教育这种社会技术,但据此能否真正实现社会团结、有序?事实上,西方社会之所以在二战后保持了较长的相对稳定和有序,除了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注重价值观引导外,福柯提出的“规训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规训的英语词义直译就是“纪律”,规训术“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它就是“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通过各种纪律或纪律形成的各种机制“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福柯,1999:156、242)。它在使人体服从纪律的同时通过提高其效用以培育人的配合意识、自控精神,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或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行动者,并将此视为人生的自我实现,积极地维系社会秩序。规训成了当代社会维系秩序重要的途径和手段。曼海姆虽然也提及作为“硬性约束”的纪律(Mannheim,1951:275-284),但他既没有给予同样的重视,也没有像福柯那样有深入的认识。

六、结 语

关于曼海姆的晚期社会学,无论如何臧否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格林(Greene,1944)在《时代的诊断》书评中指认的,“曼海姆的诊

断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时代难题的很有意义的分析”。特别是国家干预和市场自由竞争如何结合,自由民主与计划决策如何统一,至今仍是世界各国努力解决的难题。而这种意义对我们还有特殊的切题性:当前中国正处在多重转型期和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期,这既是发展的黄金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期。经过市场经济的快速洗礼,社会利益、价值观念、评判准据不断分化,社会发展出现了多种类型的不平衡。中国正在大步走入曼海姆当年的问题域:社会非理性情绪蔓延(只要上各大网络论坛,非理性的谩骂随处可见;仇官仇富情绪普遍存在);精英和民众的脱节与对立(网上民粹主义的泛滥及对“公知”的嘲弄可见一斑),或者说上层精英阶层的固化、同盟化与底层民粹化愈演愈烈,中国式的大众社会正在形成;伦理价值判断混乱、道德底线失守和潜规则盛行,个体自律与自利大面积地断裂,中国日益进入复杂性的高风险社会。有学者称“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孙立平,2011a),我们必须“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孙立平,2011b)。鉴于此,重温和细究晚期曼海姆利用社会技术进行为自由的民主计划思想,尤为必要和殊有意义。

参考文献:

- 阿隆,1992,《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刘燕清、孟鞠如、沈雁南、马燕、孙国琴、杨祖功、赵健译,北京:三联书店。
- 艾伯斯坦,2003,《哈耶克传》,秋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贝尔,1984,《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
- ,2001,《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波兰尼,卡尔,2007,《大转型》,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波兰尼,迈克尔,2006,《社会、经济和哲学》,彭锋、贺立平、徐陶、尹树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波普,1998,《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仓桥重史,2008,《技术社会学》,王秋菊、陈凡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杜拉克,2005,《经济人的末日》,洪世民、赵志恒译,台北:宝鼎出版社。
- 杜威,1964,《自由与文化》,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
- ,1981,《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87,《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9,《五大演讲》,胡适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福柯,1999,《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 戈菲,2000,《技术哲学》,董茂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郭景萍,2007,《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社会》第5期。
- 哈耶克,198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1997,《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克,2006,《理性、社会神话与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霍布豪斯,1996,《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加塞特,2004,《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考德威尔,1999,《哈耶克与社会主义》,静虚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6期。
- 科瑟,1990,《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06,《发现社会之旅》,李霞译,北京:中华书局。
- 库利,1989,《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拉斯基,1965,《论当代革命》,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勒庞,2000,《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刘小枫,1998,《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卢卡奇,1997,《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曼海姆,2002a,《中译本序》,《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02b,《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张旅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 芒福德,2009,《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米德,1992,《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米切姆,2008,《通过技术思考》,陈凡、秦书生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米瑟斯,路德维希·冯,2008a,《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王建民、冯克利、崔树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8b,《有计划的混乱》,冯克利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2期。
- 默顿,2006,《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珀杜等,1992,《西方社会学——人物·学派·思想》,贾春增、李强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萨托利,1998,《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 舍勒,1999,《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
- 斯温杰伍德,1988,《社会学思想简史》,陈玮、冯克利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苏国勋编,1996,《当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社会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孙传钊,2007,《早期的极权主义研究——兼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793.html>)。
- 孙立平,2011a,《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经济观察报》2月26日。
- ,2011b,《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孙有中,2002,《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滕尼斯,1999,《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 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
- 王飞、刘泽渊,2005,《德韶尔的技术王国思想》,《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期。
- 韦伯,1997,《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7,《前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沃林,2009,《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与创新》,辛亨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沃森,2006,《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陆月宏、胡发贵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保华,2009,《杜威关于技术的思想》,《自然辩证法研究》第5期。

亚历山大,2003,《世纪末社会理论——相对主义、化约与理性问题》,张旅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雅斯贝斯,1989,《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闰引堂,2009,《曼海姆教育社会学思想述评》,《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16),北京: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

张旅平,2006,《社会病理学研究的经典范例——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评介》,《社会理论》第2期。

周晓虹,2002,《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Adorno, T. 1997, *Prism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Durbin, E. 2003, *Problems of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Dewey, J. 2008, "The Techniques of Reconstruction." In A. Jo Boydston & W. R. Sleeper (eds.),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 (14). Carbondale, Illinois: SIU Press.

Greene, S, Lee 1944, "Book Review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

Kettler, D., V. Meja & N. Stehr 1990, "Rationalizing the Irrational: Karl Mannheim and the Besetting Sin of German Intellectual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6).

Kettler, D. & V. Meja 1995, *Karl Mannheim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The Secret of These New Time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Manheim, E. 1947, "Karl Mannheim, 1893 - 1947."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Mannheim, K. 1943, *Diagnosis of Our Time*.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 1951, *Freedom, Power and Democrat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56,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ullins, P. & S. Jacobs 2005, "Michael Polanyi and Karl Mannheim." *Tradition and Discovery* 32 (1).

Pooley, J. 2007, "Edward Shils' Turn against Karl Mannheim: The Central European Connection."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38.

Spengler, O. 1932, *Man and Technics: A Contribution to a Philosophy of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杨可

Democratic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Social Techniques: An interpretation of Mannheim's later sociology *Guan Feng* 89

Abstract: Mannheim's later sociology, with the theme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democratic planning for freedom, has a great deal of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it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and has received lots of misunderstandings. Mannheim argues that social planning itself is neutral, and it not only does not conflict with freedom and democracy, but also is internally and mutually compatible with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 realization of democratic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depends on social techniques. Among them, education and the separation and counterbalance of the three powers of modern parliament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Mannheim's later sociology has produced extensive influences, and it has valuabl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Informal Institution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 village *Wen Yingying* 113

Abstract: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ly focuses on how the provision institution or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 affects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while few researchers recognize that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 in rural China may affect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s well.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T village,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institution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T village, such as various customs and tradition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through the functioning of "social habitual memory" and "the alternate system".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by improving villagers' donation in T village.

African Immigration in Guangzhou China: A cumulative causation perspective on immigration behavior *Liang Yucheng* 134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test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rticularly the theory of cumulative causation, by examining the causal mechanisms of interna-